

考古中国

位于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以特殊的方式见证着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历史,浓缩了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信息,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融合

西夏陵是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遗存。1972年至1977年间,考古人员第一次对西夏陵进行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证实了《嘉靖宁夏新志》所载西夏陵处于贺兰山之东。西夏陵的确认和发掘,推动了西夏考古的发展。

西夏陵的整体朝向为南向偏东,西北傍高山,东眺兴庆府与黄河,背山面水、地势高敞开阔,各座陵的空中轴线都与贺兰山的某个山峦顶峰相关,借山势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弘气势。西夏陵的选址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的特点,选择西靠贺兰山的洪积扇高地,利用了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陵区内有32处防洪工程遗址,是伴随西夏陵不断拓展的过程持续建造的。防洪墙主要以石块堆砌,内填黄土,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区域建造。排洪沟直接于地面向下开挖而成,有效避免和减少了山洪对陵区相关设施的冲刷破坏。

西夏陵的构成分为地面和地下两部分。地下部分为墓道及墓室,所有的墓室均已遭毁灭性破坏,目前仅6号陵的地下部分经过考古发掘。地面部分基本呈中轴线对称分布,有三面或四面围合而成的陵城。陵城南侧为月城,与陵城平面呈倒“凸”字形。陵城内设有献殿、墓

刘 刳

5月8日凌晨,裘锡圭先生为学术而存在的人生戛然而止。裘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他的学风以严谨著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对己严格,文章不惮修改,有错必究,敢于自我否定。他做人做事一向耿直,界线清晰,爱憎分明,对不良学风毫不留情,对有损道德的事更是深恶痛绝。他的去世引起学界和社会的追思,与他的学问和人品有关。

裘先生毕生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他参与的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包括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简等,至今仍在惠及学界。他的《文字学概要》先后印过40余次,并有英文、日文等多种译本。

他在确立范式和端正学风上起到的作用,尤其值得铭记。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全凭实力服人,只靠文章说话。只要涉及专业问题,他一定想得更深入,发常人所未发,道常人所未道,往往只是有他挑别人错的可能,却很少留给别人挑他错的机会,学生和后学把获得裘先生的肯定当成很高的荣耀。他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威信和声望,靠的正是对事业超乎常人的痴迷和热爱、对学术“自苦”型的全身心投入和一生的坚守。

裘先生崇尚“实事求是”,反对言过其实,尤其是过度宣传和虚假包装。在他身边工作近20年,曾给他看过各种项目、奖项等申报书,无论是他自己的申报书,还是集体的,几乎每次他都要求改得更平实、更低调。在有些人看来,裘先生对学术的态度和做人做事的风格似乎有些“顽固不化”或“不合时宜”,但正因如此,才更凸显出学界和社会对良好学风及做人做事取向的期冀。

裘先生爱才如命,求贤若渴。“三轮车夫”蔡伟读复旦博士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起因是蔡伟成功解释了裘先生文章中一个未解的词的读法。他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蔡伟提供一个安心读书和研究的环境。为此,裘先生上下奔走,终于促成了一段“三轮车夫读复旦博士”、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

他对学生要求严苛,养成学生对待学术的端正态度,培育出一批优秀的学术传承者。很多学生回忆起裘先生的威严,都感觉曾经的威严在无形中化成了亲密。学生取得了成绩,他比自己取得成绩还高兴,毫不吝惜给予褒奖。他的学生写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他当着别人的面讲起时,脸上常泛起那种少见的欣喜和自豪。裘先生如此爱惜人才,提携后进,与他的老师朱德熙先生很像,显示了学脉的传承。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安阳的一次殷商文化会议上,我的一篇考释甲骨文的文章得到裘先生的肯定。1990年,我凭借这篇文章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从2007年始,我出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从此在裘先生的指导下为中心服务已近20年。我们住同一个单元,裘先生住8楼,我住10楼,来往便捷,所以,我常到裘先生家里求教学问,在学术上得以提升,在人格上得以淬炼。

裘先生的论著思虑之缜密,考证之详瞻,发现之重要,结论之精准,让后学景仰。他的学术追求和人格设定高标在前,让我们更加不敢懈怠。

西夏陵,见证中华文明多元融合

马 强



道、墓室、陵塔等,月城南侧中轴线两侧有碑亭、阙台等。在陵城和月城之外,有4个角台,成为界定每座陵园范围的标志物。

西夏陵的布局结构和陵寝制度,从选址理念、陵园布局、建筑形制、建筑材料等方面,继承了唐宋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比如,西夏陵结构单纯,无下宫、后陵等;增设月城,将神道变短,缩入月城之中,石像生在神道两侧呈多列排放;角台、中心台等建筑在其他时期帝陵中未见等。

碑亭在西夏陵的布局已制度化。每座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碑石残块,包括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石碑并存,显示出党项族和汉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残存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通过碑文可以了解到西夏的君主世系、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土的绿釉鸂鶒(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高152厘米,是国内已知最大的琉璃鸂鶒构件,展现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地区的传播,也体现了西夏建筑体量的宏大雄伟。

出土于各陵园碑亭的力士驮碑石座

现有11件。这些力士碑座的造型基本一致,座身正面的力士像屈膝跪坐,脸颊丰满,双目如铃,双眉粗长,眉梢上翘,塌鼻短粗,唇角斜出獠牙。这些碑座不同于中原文化常见的龟趺座,以力士形象驮碑展现出威严的气势,充满力量感,是西夏人融合唐宋佛教石刻艺术的风格创造出来的。

陵区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见证了西夏时期活跃的商贸交流活动,揭示出西夏在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中的跨区域交流活动的枢纽特征。党项族原来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后来亦从事农业生产,又逐步学习接受各种手工业行当,并吸纳汉族工匠参与制作。西夏制瓷业发达,种类繁多、器形多样,不仅深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还受到党项民族生活习俗、游牧传统的影响,是研究西夏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板瓦和槽型瓦,虽然用法不明,但经过科学检测分析,其工艺与同时期的灵武窑白瓷接近。

西夏陵为业已消失的西夏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见证,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支撑,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①: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
图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绿釉鸂鶒。

以上图片均为马强提供

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是引起疑问:这个古迹,此处遗存,是杜甫写过、东坡写过、陆游写过的吗?再造这古迹的人们有没有认真读过古人的文字?即使读过了,有没有认真复现?比如某地重建了一座楼阁,在唐代或宋代确实有过这座楼,现在重建,功莫大焉,但遗憾的是,造楼者还差一步,去典籍里,也就是我们的集体记忆里搜

深入研究的问题。

文化遗产传承,应该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来观察与呈现。具体文化现象的形成、出现与流布,其实是更广阔的大文化影响的结果。脱离了其所产生的时代气息,没有大文化观的笼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容易成为一些孤立的文化碎片。

而好的社科研究成果,需要一套灵活的机制来转化,使之体现到文化遗产传承、古城古迹保护和文旅开发上。可以聚集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挖掘、研究和整理地方文化。比如,古代交通路线与古代城镇的繁盛衰败,因为政治、军事、贸易、手工业的兴起,加上当地文化基因,应该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目,而不是千城一面。更不要说,有些项目为多样性而多样性,却忽略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个基本的旨归。

一切文化遗产都与那个时代相关,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审美相关,与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情趣相关。脱离了大文化观的笼罩,脱离了对那个时代精神的体察,保护就体现不出更大的价值,文旅开发就难免碎片化。而碎片化的结果,自然是同质化加急切的商业化,不但没有真的,要造出假的,更有甚者,是把真的也搞得像假的一样。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阿 来

寻一番,把杜甫远眺过、宴饮时的文字呈现出来。没有这些文字,这座楼恐怕并不比这个城里刚造的新楼更有价值。没有开掘其中的文化,就没了彼时生活的气息。中国的楼阁,黄鹤楼、岳阳楼之所以驰名天下、令人神往,并不只是那楼本身,更是因为李白的诗、范仲淹的文章。

我们一直强调知识成果的转化,但大多局限在科学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方面。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转换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今天,我们在文化遗产传承和古城古迹的保护与呈现过程中,如何开掘遗存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

文化遗产与保护
需要大文化观指引

裘锡圭:
『字斟句酌』的学术人生

博古知今

循着杜甫和陆游对四川的书写,我行走于古蜀道,以及他们游历和工作生活过的许多地方。万里路与万卷书相互辉映,相生互发,杜甫、陆游等文学家以真挚的态度、高超的艺术,为那个时代留下了许多生动真切的记录。这些记录不论对于当下的文化遗产发掘、非遗传承,还是文旅融合,都是宝贵的资源。

今年,我重走苏东坡生命最后一年所走过的道路。从海南儋州至江苏常州,途经海南、广东、广西、江西和江苏,这一路因为有关东坡诗词文章的辉煌,山与水、人与大地唤起的文化记忆竟是如此动人。这一路,我也在观摩体会沿途不同地方如何将他留下的遗产珍爱保护,将他曾经用心用情记录的彼时情景加以言说或呈现。

在江西赣州一段保存完好的宋代城墙上,我眺望东坡先生描绘过的山水形势。走下城头,我看见一块城砖上依然保留着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清晰字样,抚摸城砖上那隆起的笔画,突然热泪盈眶。

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唐宋诗旅中

家乡的窑火千年不熄

刘友才

说说我家乡的非遗

“金竹山,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声远,窑火烧亮半边天……”这首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至今还在我的家乡重庆市荣昌区安富古镇传唱。古老的民谣,唱出了我家乡古代陶器生产的兴盛景象,仿佛在诉说千年窑火不熄的故事。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到瓦子滩河床上捡散落的碎陶片,常听老人们说这是女婿补天剩下的泥。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些陶片片像块宝。2014年,重庆市考古研究院在我老家附近的刘家拱桥一带考古发现多座古窑,从挖掘出土的陶俑、陶罐、陶灯等陶器文物得出结论:荣昌陶的起源,可追溯至东汉。唐代至北宋,荣昌陶进入鼎盛时期,建起了马蹄窑、馒头窑,炉火映红天空。

“前山广子后山炭,中间泥巴烧罐罐。”荣昌鸭屿山脉的陶土质



地细腻,可塑性强。我见过老陶工肖师傅揉泥,陶泥在他掌心慢慢褪去生涩,现出绸缎般的光。荣昌陶制作时需经过选泥、制坯、打磨、刻花、上釉、烧窑等24道工序才能完成,每一道工序,工匠们都精雕细琢。2011年,荣昌陶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荣昌制陶艺人,在泥与火的淬炼中,匠心赓续,薪火相传。年逾古稀的梁先才,是陶器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新年的第一天,我跟着梁师傅去看“老梁家柴窑”开窑。伴随着一声“开窑喽”,只见窑门缓缓打开,一件件精美的陶器映入眼帘。开窑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千年窑火不熄,是因为匠心传承不止。梁师傅说:“荣昌陶的窑火,只有代代相承,才能越烧越旺。”如今,我漫步在古驿道,每走一步都能看到“泥精金壶排列行”。

(作者为重庆市荣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姗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里,拍摄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揭露了那场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也警示着历史不容忘却。记录下这些照片的载体——马吉摄影机及其胶片,同样陈列在展厅之中。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约翰·马吉,1884年生于美国匹兹堡,1912年作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来到南京。1937年8月15日,侵华日军首次空袭南京。11月22日,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马吉成为委员,多次开车运送伤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当日成立,马吉担任主席,在教堂、住宅、洋行等地收容保护难民,还用摄影机拍摄了日军的暴行。1940年马吉回国,1946年他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作证,1953年在匹兹堡病逝。

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在国际上传播的过程。1938年1月,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牧师乔治·费奇利用去上海采购食品药品的机会,把马吉的胶片缝在大衣衬里,秘密带出南京。费奇到上海后,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到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分别由国际人士带往美国、德国、日本等地放映。影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的美版《生活》杂志上。

二战结束后,马吉摄影机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等人的不懈追寻下才重见于世。2002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将摄影机及胶片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此后,工作人员对胶片进行了数字化转型。

约翰·马吉留下的这份南京大屠杀真实影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影片真实记录了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行径。身中30多刀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幸存者李秀英,幸存



▲马吉摄影机及胶片。

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马吉摄影机——

是历史之证,更是和平之志

周 峰

者夏淑琴一家7人被害后的情景,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鼓楼医院救治中国人的画面……每一帧都是历史再现。东京审判时,约翰·马吉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出庭作证。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时,播放了导演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不少是马吉拍摄的镜头。马吉的证词和影片,表明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成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的有力证据。2002年以来,这件文物向前来参观的100多个国家的1亿多次次静静讲述着那段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历经半个多世纪,马吉摄影机及影片依然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和美化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近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携带马吉摄影机模型,在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捷克、白俄罗斯等国举办展览,并出版《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英、日文版等书籍。纪念馆还开展国际和平教育项目“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青年观看马吉影片;47个国家的470多名青年成为纪念馆的“紫金草国际志愿者”,向外籍观众讲解马吉摄影机,用“世界语”传播这段“世界记忆”。

南京与马吉家族的友谊已延续至第四代。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他还沿着祖父的足迹,在南京举办了“历史·和平·发展——马吉祖孙的南京影像”展览,透过镜头,将现代南京与历史上的南京进行了鲜明对比。

讲好马吉摄影机背后的故事,就是以准确的史实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深入人心。正如约翰·马吉在影片解说词中所写:“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

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马吉摄影机及其胶片,不仅是历史之证,更是和平之志。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本报记者姚雪青整理)

刘 勇

唐代龙首修复记



图①:修复后的唐代龙首。
图②:工作人员在修复研究唐代龙首。

以上图片均为刘勇提供

对龙首碎块进行了观察,发现龙首胎体内含有秸秆和碎陶块,甚至还在10号龙首牙齿部位发现了陶工的指纹。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许琼副研究员团队对龙首表面元素分布进行了测试分析,发现龙首表面大面积含铅,确定龙首表面施了一层白色彩绘。同时发现,眼珠的黑色颜料含锰,眼线的绿色颜料含铜,眉毛与眼珠结合处的红色颜料含汞。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张雪雁副研究员团队对9号龙首进行了断层扫描,分析发现,9号龙首是先塑造了龙首上颌和鼻子,再以这个部分为支撑,塑造了眼睛和额头。

可以看出,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绘工艺、雕塑技艺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不过,面对上百块龙首碎块,如何拼接也是很大的挑战。

之前已经有内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出土蚌龙虚拟拼接的研究基础,我们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宋维涛教授团队,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获取了龙首碎块数据,再交由北京理工大学廖聆宇博士进行数据组合,进而开展虚拟拼接工作。以虚拟拼接为基础,实验室考古方舱成员全体上阵,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同学们参与了龙首数百块碎块的拼对工作。每拼对上一块,大家都高兴又自豪。龙首碎块拼对完成后,仍有不少缺失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存信用石膏对10号龙首缺失部分进行了补配。

历经半年多时间,我们终于成功修复了这两个龙首。修复的龙首雄浑有力、勇猛威严,为中国古代龙形象增添了新类别,为研究唐代龙首建筑构件提供了重要材料,也实证了雄安新区的千年历史文脉传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